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 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

——文献研究(下卷)

Переписка Сталина с 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Черчиллем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俄罗斯〕弗·奥·佩恰特诺夫 / 著
〔俄罗斯〕伊·爱·马加杰耶夫

于淑杰 隋 涛 赵春雷 / 等译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 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

——文献研究(下卷)

Переписка Сталина с 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Черчиллем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俄罗斯〕弗·奥·佩恰特诺夫 / 著
〔俄罗斯〕伊·爱·马加杰耶夫

于淑杰 隋 涛 赵春雷 / 等译

图字：01-2016-6208
Copyright 2015 by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Foreign Ministry of Russian Feder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World Affair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Foreign Ministry of Russian Federation
书名原文：Переписка Сталина с 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Черчиллем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俄罗斯“奥尔马梅地亚集团”出版社于2015年首次出版俄文版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 /（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奥列戈维奇·佩恰特诺夫，（俄罗斯）伊斯坎德尔·爱德华多维奇·马加杰耶夫著；于淑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SBN 978-7-5012-5592-4

I. ①卫… II. ①弗… ②伊… ③于… III. ①斯大林著作—书信集—研究 ②罗斯福（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1882-1945）—书信集 ③丘吉尔（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74-1965）—书信集 IV. ①A831.3 ②K837.127=5 ③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827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陈可望
田 林

书 名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下卷）
Weida Weiguo Zhanzheng Qijian Sidalin Yu Luosifu He Qiujiel Wanglai Shuxin — Wenxian Yanjiu

作 者
译 者

〔俄罗斯〕弗·奥·佩恰特诺夫 伊·爱·马加杰耶夫
于淑杰 隋 涛 赵春雷 等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www.ishizhi.cn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新华书店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1000毫米 1/16 41¼印张
688千字 64幅图
2017年11月第一版 201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5592-4
198.00元（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下 卷

第6章 联盟合作巅峰	1
第7章 尾声的开始	137
第8章 从雅尔塔到罗斯福离世	337
第9章 “伟大联盟”的强弩之末	423
人名索引	633
事件及专用名词索引	647

联盟合作巅峰

1944年上半年战争形势的主要特点是苏军持续向西推进。由于1—5月间苏军的进攻战役势如破竹，德国法西斯军队在三个主要方向——西北方向的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城下、第聂伯右岸地区和克里米亚已经彻底溃败。苏联军队则攻入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爱沙尼亚，兵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并在罗马尼亚开始实施军事行动。从年初的形势便可预见，红军将很快解放苏联全境，恢复1941年时的疆域，收复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布科维纳（Буковина）。1944年1月丘吉尔致信E.艾登（Иден Э.）时写道：“俄国人很快将占领这些地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显而易见，把他们从那里排挤出去的想法可以休矣。”¹如此一来，不久前尚在困扰盟国关系的苏联西部边界问题，除苏一波边界外，事实上都已经解决。尽管盟军进军罗马的行动因敌军负隅顽抗而遇阻，但从德国人控制下解放意大利的行动却从未停息。全面进攻欧洲大陆的行动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欧洲国家即将从法西斯占领中解放出来的预期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国家未来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走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莫斯科默许意大利划入西方势力范围，那么对苏联安全有着特殊战略意义的、与其接壤的东欧与巴尔干国家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夏季到来之前形势已渐趋明朗，红军即将解放该地区的大部分领土，苏联将在影响力方面取得优势。实用主义至上的英国外交部门谋求通过秘密划分欧洲势力范围来解决问题，借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优势，来换取在于已重要的希腊和东地中海地区保持优势影响力。艾登在《英国在巴尔干的目的计划书》（1944年6月）中称，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我们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地位”，同时避免“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正面挑战苏联的影响力”。²5月5日，艾登在与古谢夫的会晤中首次试探莫斯科的反应，莫斯科做出了回应，但不想绕开华盛顿单独做交易，以免束缚自己的手脚。美国领导人对英国人的势

力范围划分方案持怀疑态度，他们承认苏联不可避免会在该地区获得优势，同时力求东欧为其商品、意识形态和资本保持开放。

波兰未来的命运是这方面最为敏感的问题，在1944年的三国领导人往来书信中，它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1943年春，苏波断绝外交关系后，英国及美国外交部门不同程度地努力协调了双方关系，但这些尝试一方面遭遇流亡伦敦的波兰人顽固的反俄势力的抵制，另一方面则是莫斯科强硬要求承认所谓“寇松线（Линия Керзона）”作为新的苏波边境，并在未来的波兰政府组成中安插亲信。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苏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必须要在波兰有一个亲苏政府的存在，但不能接受波兰公开苏维埃化。斯大林一方面逐步推动亲苏政府的建立，同时，作为妥协，并不拒绝尝试改组S.米科瓦伊奇克（Миколайчик）政府。但是，这种妥协未能奏效，丘吉尔在“伦敦人”与莫斯科之间尝试斡旋只招致了双方的不满与猜疑。斯大林认为丘吉尔企图保留反苏的波兰（“防疫线”），他与丘吉尔就波兰问题的通信时有激烈言辞（第399、414号文件）。在波兰事务中扮演“第二提琴手”角色的罗斯福开始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日渐活跃，他一方面积极回应“伦敦人”的呼声，因为后者将其视为中立和进步力量的代表，另一方面也迫于美国人数众多的波兰侨民的国内政治压力，而且恰逢总统大选之年。罗斯福在华盛顿接见了米科瓦伊奇克，同时也应斯大林请求，允许定居美国的波兰亲苏人士访问莫斯科。

- 7 在南斯拉夫各方的利益冲突较为缓和，英国与美国逐渐放弃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对手D.米哈伊洛维奇（Михайлович Д.）的切特尼克（Четники）游击队的支持，同时他们认为，从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南斯拉夫的主要政治力量非J. B. 铁托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莫属。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力促铁托与国内其他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合作。斯大林与丘吉尔在书信往来中经常相互通报己方的南斯拉夫政策，以协调对策。同时，为争夺对铁托和政治事态的全面影响力，各方也在暗中较量，包括英美之间也是如此。

如上所述，苏联和英国私下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渐成趋势，但英国人并不甘心完全让出自己的地盘，特别是试图继续保持在罗马尼亚的存在，莫斯科对此极为不满。巴尔干半岛问题在高层通信中鲜有反映，但1944年春丘吉尔与莫洛托夫的通信对此进行了积极讨论，该问题对于盟国关系，首先是苏英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瓜分已投降的意大利海军是当年年初激烈讨论的新问题。尽管在德黑兰已经就此做出了原则性决议，但是盟国并不急于执行，斯大林不得不倾注更多的努力，以使丘吉尔和罗斯福对苏联应得的意大利海军份额进行部分补偿

(第371、387、388、392、402号文件)。

战后经济合作问题也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主要倡导者是华盛顿,美国的经济潜在战争期间成倍增长,因此,美国比另外两国更加关注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及建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苏联领导层由于期待美国帮助其进行战后重建,因此暂时没有拒绝参与这一合作(第406号文件)。

对苏供给情况也明显改善:北方护航运输队的航行安全得到保障,美国的军工生产达到最高水平,途经伊朗走廊与阿拉斯加—西伯利亚(Аляско-Сибирь)航线的货物运输增加。因此,盟国开始正常履行对苏租借法案(Ленд-лиз)规定的义务,这无疑对1944年苏军进攻行动的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就这一问题的往来信件是以在友好的气氛下互通消息为主。

8

“霸王”行动的准备和实施标志着盟国军事合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为继续贯彻德黑兰决议,苏军统帅部计划实施大规模夏季攻势以策应诺曼底登陆,美军航空兵开始从苏联的乌克兰机场群起飞,对东欧被占领地区实施穿梭轰炸(“Франтик”行动,字面意思为“狂暴”),秘密军事情报交流急剧增加,苏联方面积极行动,参与盟军对敌伪装欺骗(“Бодигард/Bodyguard”,或者“护卫”行动),以掩护在法国北部的登陆行动。上述所有问题在往来书信中皆有反映。

与盟军在意大利取得的鸡肋战绩相比,苏联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更加直观地告诉世人决定战争命运的关键所在,此时苏联在美国和英国公众眼里的威望大增。著名的《纽约时报》在3月份刊登了题为《俄国在前进》的编辑部文章,文中写道:“俄国再次向世人有力地证明,谁也休想征服它,沉醉于伪地缘政治理论,期望在过去的战争中毁灭俄国和妄图称霸世界的德意志梦想随之灰飞烟灭。”³ 斯大林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其个人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即使是在盟国关系明显升温的时期,也未能避免有损互信和引起猜忌的事件发生,其中包括私下秘密与敌接触。最典型事件当属1944年1月《真理报》刊登的有关德英高层在开罗接触的报道,该报道引起伦敦方面的愤怒(第369号文件)。丘吉尔对斯大林指责其泄露有关波兰问题的通信内容也做出相当强烈的反应(第413、418号文件)。新解密外交档案文献结合英国史料,首次全方位揭示了苏英关系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9

尽管困难重重、分歧不断,但为了在所有战线击退敌人,反法西斯同盟仍积极地积蓄能量,协同动作。斯大林的评价毫不夸张,他在1944年11月说道:“不应该对存在的分歧大惊小怪,而应该为分歧少之又少,且几乎每次都

是三大国本着团结一致行动的精神予以解决而称奇。”⁴

* * *

1943年年底之前，苏联军队不仅光复之前被德国人夺占的城市，而且正在准备转入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正如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在11—12月的每一天，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在指挥我军前线进攻行动的同时，还忙于制定当年冬季的战役计划。”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之后，苏联的战争实力明显增强，使以下构想成为可能：“从列宁格勒到黑海全线展开进攻战役，战役目的是以最快速度从占领者手中解放苏联国土，战役重点是在苏德战场两翼。进攻行动的想定是，在相距不同距离的战线上，按不同时间，分区段依次实施一系列战略性战役。”⁵

1943年12月24日，第1乌克兰方面军在西南方向开始实施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Житомирско-Бердичев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这仅仅是更大规模的第聂伯—喀尔巴阡山（Днепровско-Карпятская операция）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序曲，战役一直持续至1944年5月6日。1943年12月31日与1944年1月1日之交的新年之夜，日托米尔失而复得，1月5日解放别尔季切夫，这成为战争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方面军部队成功为“突击两翼和占据第聂伯河右岸卡涅夫（Канев）地区的敌后方集群创造了先决条件”。⁶1月5日当天，第2乌克兰方面军也投入了进攻行动，历经三天激战，解放了基洛夫格勒（Кировград）这一重要的交通枢纽。然而，德国人仍然负隅顽抗，并成功调集预备队。到1月16日，第2乌克兰方面军部队被迫转入防御。

- 10 斯大林在苏联军事与外交双双取得胜利的背景下信心倍增。据朱可夫回忆，从德黑兰回国后，斯大林曾说道：“罗斯福坚称将于1944年在法国展开大规模行动。我想他会信守承诺。不过，就算他食言，我们自己也有足够的力量打到希特勒德国的老巢。”⁷

在例行的信件中，丘吉尔一边祝贺斯大林取得的最新军事胜利，一边向斯大林保证会履行德黑兰达成的开辟“第二战场（Второй фронт）”的承诺。艾森豪威尔（Эйзенхауэр Д）被任命为战役总指挥官，“霸王”行动的具体准备工作启动。蒙哥马利（Монтгомери Б）将军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官，他在前往就职的途中拜会了丘吉尔。1943年12月，他还不是战役远征军群司令的唯一人选。当时各方意见不一。正如丘吉尔12月14日致信副首相艾德礼时所称，艾森豪威尔“也许更看好亚历山大……我暂时没有确定，任命亚历山大

还是蒙哥马利……”⁸ 尽管在12月15日英国内阁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但天平明显倾向蒙哥马利一边。⁹

蒙哥马利的名望在最终决策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公众舆论“因艾森豪威尔取代马歇尔（Маршалл Дж.）而瞠目结舌”，英国战争大臣P.格里格（Григ П.）这样说道，¹⁰ 委任阿拉曼战役的功臣蒙哥马利应是众望所归。丘吉尔在12月19日致罗斯福的信函中对争论做了小结：“内阁是正确的，因为蒙哥马利是民族英雄，他能让我们和人民充满信心，贵国人民也会同意。”¹¹ 12月24日，蒙哥马利被正式任命为盟军集团军群司令，在艾森豪威尔的总指挥下实施诺曼底登陆作战。

战争在继续，在解决与战争直接相关的问题时，围绕战后世界命运的外交角力也呈白热化。“波兰问题”位列榜首。1943年底至1944年初，在“三大国”关系总体升温的背景下，伦敦认为有必要“开导”波兰流亡政府，向他们转达了苏联的合理建议。早在11月17日，艾登就告知丘吉尔，米科瓦伊奇克希望首相在与斯大林聚首德黑兰之前，先与其会面，艾登形容不久前收到的波兰边境问题的备忘录是“非建设性”的，他强调说：

“……我有这么一种印象，虽然波兰流亡政府不愿直接对俄国人让步以换取关系正常化，如果有英国和美国担保的话，他们情愿由他们的朋友，也就是国王陛下政府代其做出某些决定。”¹²

丘吉尔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与贝奈斯（Бенеш）的会面，按照他的设想，贝奈斯的参与有助于说服“伦敦的波兰人”在东部边界问题上向莫斯科妥协。这位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要求拜见丘吉尔，他告诉首相，他要向首相转达斯大林的“兄弟般的拥抱”，并讲述他在莫斯科令人振奋的谈判。¹³ 贝奈斯为丘吉尔带来了斯大林描绘的波兰新边界地图，丘吉尔稍作考虑之后，于1月6日写信给罗斯福：“这对于波兰人来说是个不错的生存地，面积超过300平方英里，并且有250英里的波罗的海海岸。”¹⁴

南斯拉夫问题是书信往来中的另一个主要议题。1943年年底，丘吉尔尽管对铁托游击队印象不佳，但他终于明白，恰恰他们才是在巴尔干抵抗德国人的中坚力量。丘吉尔在德黑兰时承认，铁托游击队“比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更善于同德国人战斗”。¹⁵ 外交部前官员F.麦克莱恩（Маклин Ф.）1943年11月在开罗时曾向丘吉尔证实此言属实，麦克莱恩于1943年7月率领英国代表团拜访过铁托。¹⁶ 1944年1月他又回到了巴尔干。在努力与铁托缓和关系的同时，丘吉尔希望铁托善待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卡拉乔治维奇（Петр II Карагеоргиевич），伦敦希望后者有所作为。艾登在1月初把自己与

丘吉尔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通信发放给内阁成员，他同时强调说：

12 “我们两人都非常关注国王与游击队的和解问题，不过他（丘吉尔——作者注）认为，达成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是国王解除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不得不考虑铁托对米哈伊洛维奇公开表示反感这一事实，同时还有铁托游击队的态度，他们认为，国王继续与米哈伊洛维奇以及以米哈伊洛维奇和开罗流亡政府为代表的泛塞尔维亚势力保持联系，玷污了君主制的声誉。还有很多实例可以佐证这个观点。

但我倾向于另一种意见，如果在铁托答应承认他（国王——作者注）之前，国王就断绝与米哈伊洛维奇的联系，那么国王就失去了对南斯拉夫最后的影响力，有可能丧失塞尔维亚大部分公众的支持，在塞尔维亚支持君主体制的势力非常强大……更重要的是，断绝与米哈伊洛维奇的关系无疑将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很危险的是，米哈伊洛维奇有可能成为我们满足苏联政府的祭品，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倾向于和苏联政府在此问题上协同动作，就像和美国政府一样。”¹⁷

艾登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游击队和铁托在巴尔干的地位不断巩固，他们对待国王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几乎在德黑兰会议召开的同时，于11月29—30日，在亚伊策（Яйце）（波斯尼亚）举行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议会（АВНОЮ）第二次会议，大会确立人民解放议会为“南斯拉夫最高立法和执行机构，是南斯拉夫人民权利和国家主权的最高统一代言人”。早在1943年11月初，铁托就声称，“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以及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和国王为达到自己回国的目的，而肆意歪曲莫斯科会议（外长会议——作者注）决议”，¹⁸就足以证明采取这种措施的紧迫性。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议会会议公报中的措辞更为强硬：“……叛徒流亡‘政府’丧失了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所有权利，无论何地，无论对谁，他们都无权代表南斯拉夫人民。”¹⁹

13 苏联派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的协议在德黑兰时已经达成。团长为Н.В. 科尔涅耶夫（Корнеев Н. В.）中将。1月中旬，代表团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抵达塞浦路斯，并在2月从那里到达目的地。丘吉尔之子伦道夫（Рэндольф）曾在皇家第4骠骑兵团正式服役，但当时被借调到特种空勤团（САС）；他是英国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麦克莱恩的密友。丘吉尔和斯大林“唠家常”大概是希望巩固在德黑兰会议上得到改善的私人关系。但根据一切迹象判断，给人留下的印象恰恰相反。据戈洛瓦诺夫（Глованов）元帅回忆，苏联军方不仅仅从丘吉尔口中得知伦道夫已经大张旗鼓地抵达。当向斯大林报告这一消息时，“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道：请你们注意，首相的儿子不会这么简单

地跳伞，没有特定目的也不会出现在他人的司令部”。²⁰稍晚些时候，即1944年春季，德国人突然袭击德瓦尔村（Дрвар），那里正是铁托司令部所在地，此时斯大林的怀疑更加具体（据戈洛瓦诺夫证实）：

“……我们的同志通过所有渠道都无法与铁托司令部取得联系。这绝非偶然。

斯大林踱步片刻，便停下来若有所思地，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想知道，这到底是谁的杰作？……看来，小子们没有虚度光阴。”²¹

铁托曾致信丘吉尔，祝愿他早日康复，丘吉尔在1月8日给铁托回信，他同时将此信抄送给罗斯福和斯大林（第360号文件），丘吉尔在信中表示，希望苏联军事代表团能与麦克莱恩率领的代表团合作融洽。斯大林对丘吉尔致铁托的信函（第362号文件）做出积极反应是必然的：当时苏联不希望与伦敦和华盛顿的关系复杂化，同时是为了化解潜在的矛盾。甚至在铁托对英国人的谈判立场明显软化之后也是如此，该谈判于1943年12月底在开罗举行，议题涉及君主政体的保留问题、可能推迟承认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民族委员会的问题，等等。苏联通过季米特洛夫（Димитров Г.）口头呼吁铁托，要灵活行事：

“希望……在进行声讨国王的宣传问题上，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以便更有效地瓦解其在国外和塞尔维亚的拥护者，并争取英美对人民解放军的物资援助，扫除他们自己制造的障碍。例如可以宣布，如果国王放弃对民族委员会的敌对立场，那么民族委员会也将停止一切反国王宣传。”²²

14

丘吉尔所说的“帮助希腊人”的缘由是，苏联政府同意了伦敦的请求，支持希腊首相E.楚德罗斯（Цудерос Э.）呼吁希腊两大敌对军事派别游击队停止内战，并联合力量与德国人作斗争。两大军事派别分别是：希腊民族解放阵线（ЭАМ）的武装分支希腊人民解放军（ЭЛАС）和希腊共和同盟（ЭДЕС）。1944年1月3日，古谢夫大使代表苏联对这一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希腊政府与游击队的谈判最终达成停火和停止敌对军事行动协议，各方于1944年2月29日在伊庇鲁斯（Эпир）签署协议，由于签署地点位于阿拉赫索斯河（Арахтос）的布拉卡桥（Плака）上，协议也因此而得名。

总的来看，1944年之前希腊问题并不是矛盾的焦点。英国人也一直保持着戒心。1943年11月艾登向自己的同僚解释说：“俄国人曾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作者注）明确声称，他们没有兴趣、也不会保持同希腊的联系，意在说明他们将希腊视为我们的势力范围，但是可以预见，如果民族解放阵线掌控希腊的话，俄国人的态度就会随之发生改变。”²³

总之，“希腊问题”既可以是激化苏英关系的催化剂，也可以是达成某些协议的基础。

358.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函

1944年1月4日发

1944年1月6日收

私人，绝密

15 1. 您指挥的后维捷布斯克（Витебск）和基辅以西和西南方向的势如破竹的进攻使我们欣喜若狂。我希望月底前也能尽我们的绵薄之力，为此我正在努力。此时，“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速进行。蒙哥马利将军赴远征军集群就职途中将在此停留，他将担任这支大军的指挥。他对计划细节自然有自己的打算，他随时准备投入对敌作战，也有信心找到解决办法。

2. 贝奈斯总统今天同我会面。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有助于帮助波兰人恢复理智。

3. 我日渐康复。比弗布鲁克（Бивербрук У.）同我在一起，他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犬子伦道夫将与我们代表团团长麦克莱恩准将一起伞降到铁托那里，这样我将更好地得到情报。所有军官都已经得到指示，要求同您派出的任何代表团进行最为紧密协调的合作。非常感谢您在希腊问题上的帮助。

在与丘吉尔会晤时，贝奈斯讲述了不久前，即1943年12月底，访问莫斯科的印象，以及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面的感受。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相信，苏联政府准备与波兰实现关系正常化和保证波兰的独立主权，前提是波兰人承认寇松线为东部边界，并撤换伦敦流亡政府成员中的极端反苏人士。丘吉尔对此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贝奈斯就此写道：“他认为，波兰人应该同意我带来的莫斯科给米科瓦伊奇克出具的条件，他让我回到伦敦后应该首先会见艾登，然后和米科瓦伊奇克会面，最后和艾登一道以朋友的身份劝说他们立刻同莫斯科展开谈判，并接受斯大林的建议。”²⁴ 贝奈斯接受了委托，回到伦敦。但是“伦敦人”不听规劝。1月5日，米科瓦伊奇克政府在未与英美政府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发表声明，对承认新边界问题没有任何暗示，只是呼吁波兰抵抗运动在恢复苏波关系的条件下与进入波兰境内的苏军合作。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回信中提到的正是这件事。

回信草稿是由捷卡诺佐夫（Деказонов В.Г.）起草的，莫洛托夫极为挑剔

地进行了修改。而“当家的”只做了一处补充，但却极富表现力（斜体字标识——作者注）。²⁵

359.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秘密信函

16

1944年1月7日发

1944年1月8日收

1. 您1月5日的来函收悉。您关于正在全速准备“霸王”行动以及将在本月还要采取其他措施的消息令我感到高兴。

2. 既然您提到这个问题，应当说，如果根据波兰流亡政府的最新声明以及波兰活动家的其他言论判断，显然已没有理由寄希望于成功说服这群人。这些人已不可救药。

3. 请您转达我对比弗布鲁克男爵的感谢和良好祝愿。

4. 尽管德国人仍在个别地区负隅顽抗，但我们的进攻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一定战果，特别是在南线。

360.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函

1944年1月10日发

1944年1月12日收

私人，绝密

我委托近日即将伞降的代表团捎去致铁托的信件。兹将此信文本寄送给您仅供个人阅：

“1944年1月8日，非洲

先生，

您以您本人和英勇的南斯拉夫爱国者和游击队的名义，殷切来信关心我的健康状况，在此深表谢意。我从我的朋友埃什金（Эшкин）少校那里详细了解了您的英勇行为。我诚挚希望通过海上供应、空中支援以及‘别动队’作战来给予您尽可能的帮助，以此援助您在半岛上的战斗行动。麦克莱恩准将也是我的朋友和下议院的同事。我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少校同他一起出现在您的司令部，伦道夫也是国会议员。我们的至高目标正是：肃清欧洲大地上卑鄙的法西斯纳粹祸患。您可以相信，我们英国人没有操纵南斯拉夫未来政体的意愿。同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更加和睦相处，同仇敌忾，并

17

根据人民的意愿解决今后的政体问题。

我已决定，英国政府未来不会再向米哈伊洛维奇提供任何军事援助，而只向您提供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不再过问政事，我们也会很高兴。但是，彼得二世国王是年轻人，刚刚逃出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魔掌，他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和落难的年轻王子来到我们这里。英国如果抛弃他便不够侠义和诚实。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中断与自己国家所有的联系。因此，我希望您明白，在给予您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的同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继续保持同国王的官方关系。我还希望双方能够停止争执，因为这只会有利于德国人。

您可以相信，我将在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保持最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工作；我诚挚希望，苏联政府派至您大本营的军事代表团与麦克莱恩准将率领的英美代表团能同样齐心协力地开展工作。请您通过麦克莱恩准将给我写信，告知在您需要我提供帮助的地方，我当然会竭尽全力所能。

期待着您苦难的终结和全欧洲从法西斯暴政下解放出来。

请相信我。

温斯顿·丘吉尔”

18 伦敦方面继续全神贯注于苏德战场的战况，特别是南翼。联合侦察委员会定期向首相和内阁汇报当前局势。1月份的一份报告称：“目前，德国人在南部战区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俄国人在日梅林卡（Жмеринка）地区成功切断利沃夫—敖德萨（Львов-Одесса）的铁路干线，那么德国人在南方的铁路运力将缩减60%—70%。”²⁶ 丘吉尔在致斯大林的下一封信函中，显示了他在军事问题上的消息灵通。

丘吉尔与英军司令部主张登陆罗马以南的安齐奥（Ацио），以便对亚平宁半岛（Апеннин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上阻击盟军主力进攻的德军后方实施打击。1月5日，丘吉尔致信罗斯福写道：“……我们正面临着一场苦战。”²⁷ 罗斯福与参谋长联席会议（ОКНШ）勉强同意了为此次行动投入两个师的兵力，并且在丘吉尔主持的突尼斯圣诞节会议期间，英美联军司令部就“鹅卵石”（英文为Shingle）行动计划协调完毕。最终行动目的是夺取罗马并使盟军推进至比萨—里米尼（Пиза-Римини）战线。行动定于1月21日开始。丘吉尔用最笼统的几句话在下一封信函中通知了斯大林。由于自己的计划得到赞扬，在非洲温暖的阳光下完全康复的丘吉尔明显心情大悦，他的情绪从他祝愿柏林的玩笑话里可见一斑。

起初，丘吉尔的信中有一段是自己同贝奈斯进行的充满希冀的谈话，不过谨慎的艾登考虑到斯大林刻薄回应波兰人“不可救药”的话语，他建议丘吉尔将这段话删除，“在您与波兰人会面之前，不用在致斯大林的信函里有过多解释”。²⁸ 丘吉尔听从了这个建议。丘吉尔在信的结尾加上了温暖的一句话，可能是为了回应斯大林1943年12月27日的来信，那封信的结尾也用的是温暖的语气。

361.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信函

1944年1月12日收

私人，秘密

我们一直在关注苏军惊人的推进速度。我并非专家，但觉得日梅林卡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假如我们重归德黑兰，我会在谈判桌上对您说：“请提前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应当停止摧毁柏林，以便留下足够的房屋供苏军驻扎。”

19

此时我们关于意大利会战的一切计划的制定已令人满意地完成。

我以自己的、有力的、真诚的手回握您的手。

尽管红军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进攻顺利，但是敌人仍在负隅顽抗，因此苏军指挥部的计划时常被打乱。华西列夫斯基回忆：“1月9日，大本营代表Г.К.朱可夫（Жуков Г. К.）与第1乌克兰方面军指挥部共同向大本营上报了下一步的战役想定。右翼战线在10—12天内推进至戈伦河（Горынь）与斯卢奇河（Случь）；中部和左翼战线击溃日梅林卡与乌曼的敌军集群，夺占文尼察（Винница）、日梅林卡、乌曼（Умань），并进军柳巴尔（Любар）—赫梅利尼克（Хмельник）—图利钦（Тульчин）—乌曼（Умань）一线。”²⁹ 但只过了一天，曼施泰因（Манштейн Е.）指挥的德军完成预备队集结之后，开始在文尼察地区及乌曼西北实施反突击。艰苦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月底，德国人将红军先头部队压退了25千米—30千米。

即便如此，柏林的德军司令部也非常清楚，继续退却已成定局。1943年12月，希特勒向曼施泰因下达了关于文尼察的命令，该城市即著名的“狼人（Вервольф）”大本营，在1943年3月成为“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命令如下：“令曼施泰因弃城，焚之。”文尼察在1944年3月20日到来之前完

全解放。

斯大林接受丘吉尔关于柏林的玩笑，仿佛继续着他们11月28日在德黑兰的对话。当时，大家在担心德国可能快速恢复元气时，“最高统帅”形容德国人是“无所不能的人，爱劳动讲文明”。³⁰ 他们“重建”废墟的能力毫不令人怀疑。斯大林适时提醒了英美在德黑兰就“霸王（Overlord）”行动的承诺。恰恰在1月初，丘吉尔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考虑对已经协调的计划进行某些变通：预计6月2日战役行动开始，缩减在法国南部的登陆[“铁砧（Энвил）”行动]规模。但美国总统力劝丘吉尔不要过早将消息告知斯大林：“我认为，自我们三人在德黑兰的约定算起过去不过月余，心理上最不能接受此时听到这样的消息。”³¹

362. 斯大林致丘吉尔的私人秘密信函

1944年1月14日发

您1月12日的来函收悉。我军近期的确取得了战绩，但到达柏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德国人正在进行猛烈的反攻，特别是在文尼察以东地区。当然，这并不危险，不过德国人还是击退了我们的先头部队，并暂时阻止了我们的推进。所以您不用手软，甚至可以尽量加大对柏林的轰炸强度。德国人还来得及在我们抵达柏林之前，重建一些您和我们需要的房屋。

您信中对铁托的支持和鼓舞将具有重大意义。

我希望，贵方和美国人的“霸王”行动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363. 丘吉尔致斯大林的私人信件

1944年1月13日发

1944年1月15日收

您1月2日来函中许诺的乐谱已收悉，国歌将于周日晚9时新闻广播前由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全体乐手演奏。

演奏一次苏联新国歌事情还不算完。发出这封信后，丘吉尔致电传媒大臣B.布莱肯（Б. Брэкен）称，英国广播公司首先应当声明该乐谱“是斯大林元帅应我的请求而发给我本人的”，其次应当“在每次报道俄国人胜利的时

候”都要演奏国歌。³² 由此，丘吉尔履行了早先向斯大林许下的诺言（第355号文件）。 21

护航运输队是丘吉尔讨好斯大林的另一种方式。1月7日，在与罗斯福讨论可能修改早先商定的计划时，丘吉尔同时告知准备派遣新的护航运输队：如果美国人出船出货，英国也可以提供护航。³³ 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英国首相也提到了海军上将弗莱泽（Фрэйзер）与北方舰队（Серверный флот）海军上将A. Г. 戈洛夫科（Головко А. Г.）之间有趣的会面，他们曾在12月16—17日和27—28日两次见面。戈洛夫科详细的日记³⁴再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

弗莱泽是“饱经世面的‘海狼’，英国海军部的栋梁之一”，根据戈洛夫科的记述，弗莱泽随同护航舰队一道前来的消息引起了这位苏联将军的不安：“12月14日……（英国——作者注）联络处忙作一团。联络处主任阿切尔是个非常傲慢的人，这一点有别于其前任费希尔（Фишер）。他企图借弗莱泽即将到访的机会，给我提出一大堆不是问题的问题……弗莱泽到底为何大驾光临呢？”12月16日，同弗莱泽手下的参谋长进行的谈话一直围绕着这位英国海军上将的过去：国内战争时期他帮助过白军，结果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并关入监狱，他以其特有的英国式的幽默甚至对此表示“感谢”，“因为关押弗莱泽将军的监狱伙食不好，却使折磨他已久的溃疡自愈”。在停靠在科拉湾（Кольский залив）的“约克公爵（Герцог Йоркский）”号上，与弗莱泽本人的会面也未能使戈洛夫科平静下来。尽管英国人殷勤接待，为客人奉上了“现烤的美味白面包”，戈洛夫科仍旧困惑不解：“我还是不明白，不列颠宗主国海军司令在最漫长的极夜到我们这里来，到底有何贵干。”12月19日英国人突然开航也留下了疑问：“英国人又急着去哪里？”谜底很快被揭开——迎战“沙恩霍斯特（Шарнгорст）”。在此次行动中，戈洛夫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派出两艘潜艇截击战列舰，随后又为英国舰队提供燃料，供其返回位于斯卡帕湾（Скапа-Флоу）的驻地。但是，击沉敌舰的消息带来的喜悦掩盖不住其中的“苦衷”： 22

“12月27日……见到弗莱泽，并向他表示祝贺。他简要介绍了战斗情况。细节尚不完全明确，因为驱逐舰还没有全部返航。他应该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弗莱泽更多地是在谈自己的损失，他担心他们的命运……”

12月28日。英国海军部无疑将确定击沉“沙恩霍斯特”号的细节。他们也不愿意对我们多说，尽管弗莱泽将军与他的参谋部应当明白，我们非常希望了解从得救的希特勒分子口中得到的情报……不要紧，我们自己也有情报可用。”